

【昨日书林】



雷海宗 著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昨日书林】



雷海宗 著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 雷海宗著. — 郑州 :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348-6707-1

I . ①中… II . ①雷… III . ①文化史—研究—中国 ②军事史—研究—中国 IV . ① K203 ② E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0677 号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出版 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 话：0371-65788808 65788179)

出 品 人：张存威 赵学军

策 划 人：吴 浩

责 任 编辑：唐志辉 翟 楠

发 行 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开本：640mm × 960mm 1/16

字 数：130 千字 印 张：11.25

版 次：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33.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关于“昨日书林”

民国时期正是中西方文化发生激烈碰撞的时期，这种碰撞造就了一批民国的学术大师。这批学术大师肩负起了引进、探究西方文化和整理、继承中国文化的双重使命，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他们给我们留下来大批具有较高价值的著作，虽然历经岁月洗磨，至今仍熠熠生辉。

出于种种原因，这些著作，有的版本繁多，内容不一；有的久不再版，以至于一书难求；有的混于历史，销声匿迹。有鉴于此，我们组织出版了“昨日书林”这套丛书，将这些经典著作重新发掘、整理出来，推荐给读者。

丛书名曰“昨日书林”，即有“昨日”与“书林”两层含义。所谓“昨日”，概指收录图书的时间范围。丛书所收录图书的作者是在某一方面有特长的专家、学者，并且主要活跃于民国时期。这里所说的民国时期是指 1912～1949 年。然而一些著作的成形，可以追溯至 1912 年之前若干年，或者延伸至 1949 年之后若干年，因其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亦酌情收录。而“书林”二字，本来有“丛书”的意思，这里亦指那些经久不衰、卓然于普通图书的民国

经典著作。

“昨日书林”首批计划选取民国经典著作200种，大致分为两种方式出版：一种是横排简体，一种是原版影印。其中横排简体部分又分为社科、文艺和译著三类。原版影印主要选取金石、图录等具有一定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的著作。

我们的发掘、整理工作，正如沧海拾珠，虽不免有遗珠之憾，但至少有拾珠之得，可以积少成多。希望经过我们的努力，“昨日书林”这套丛书能成为一座靠近民国大师、品味经典著作的桥梁。

编者

序

本书上编的几篇文字是抗战前三年间在清华大学发表的。最晚的“中国的家族”一篇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一日出版；一周后的夜间，著者在宁静的清华园，就被卢沟桥的炮声由睡梦中震醒。

“中国的元首”（原名“皇帝制度之成立”）见于《清华学报》。“中国的兵”、“中国的家族”（原名“中国的家族制度”）、“无兵的文化”、“中国文化的两周”（原名“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都先后见于清华大学的《社会科学》。除一二字句的修改外，此次合刊仍保留初刊时的原像。

下编中，“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是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十三日汉口《扫荡报》的一篇专论。“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与上下两编前的总论，都是特为此次合刊而作，前此未在他处发表。

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雷海宗于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目 录

上 编

总论——传统文化之评价	3
一、中国的兵	4
(一) 春秋	5
(二) 战国	9
(三) 秦代	15
(四) 楚汉之际	19
(五) 西汉初期	22
(六) 汉武帝	26
(七) 武帝以后——光武中兴	38
(八) 东汉	42
(九) 后言——汉末至最近	52

二、中国的家族	54
(一) 春秋以上	55
(二) 战国	56
(三) 秦汉以下	66
(四) 结论	72
三、中国的元首	74
(一) 列国称王	75
(二) 合纵连横与东帝西帝	77
(三) 帝秦议	81
(四) 秦始皇帝	82
(五) 汉之统一与皇帝之神化	84
(六) 废庙议与皇帝制度之完全成立	91
(七) 后言	93
四、无兵的文化	95
(一) 政治制度之凝结	96
(二) 中央与地方	100
(三) 文官与武官	102
(四) 士大夫与流氓	105
(五) 朝代交替	109
(六) 人口与治乱	111
(七) 中国与外族	116



五、中国文化的两周.....	121
(一) 正名	122
(二) 中国史的分期	130
(三) 中国史与世界史的比较	148

下 编

总论——抗战建国中的中国.....	155
六、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	158
七、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	164

上 编

总 论

——传统文化之评价

本编各篇都是对于中国旧文化批评论价的文字。前三篇由三个不同的方向探讨秦汉以上的中国——动的中国。第四篇专讲秦汉以下的中国——比较静止的中国。第五篇合论整个的中国历史。五篇文字当初虽曾分别问世，但勉强尚有一贯的线索可寻，内中大半可说是非议与责难，但并不是无聊的风凉话；又有一部分是赏鉴与推崇，但并不是妄自尊大的吹嘘。此中自赞的话，已由抗战的过程证明为真言；自责的话，至今也无修改的必要。此次抗战，是抗战而又建国。若要创造新生，对于旧文化的长处与短处，尤其是短处，我们必须先行了解。中国文化，头绪纷繁，绝非一人所能彻底解明。这几篇文字若能使国人对于传统的中国多一分的明了，著者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一、中国的兵

- (一) 春秋
- (二) 战国
- (三) 秦代
- (四) 楚汉之际
- (五) 西汉初期
- (六) 汉武帝
- (七) 武帝以后——光武中兴
- (八) 东汉
- (九) 后言——汉末至最近

历代史家关于兵的记载多偏于制度方面，对于兵的精神反不十分注意。本文范围以内的兵的制度，《文献通考》一类的书已经叙述甚详。所以作者的主要目的是要在零散材料的许可范围内看看由春秋时代到东汉末年当兵的是什么人，兵的纪律怎样，兵的风气怎样，兵的心理怎样；至于制度的变迁不过附带论及，因为那只是这种精神情况的格架，本身并无足轻重。作者相信这是明了民族盛衰的一个方法。

(一) 春秋

西周的兵制无从稽考，后世理想的记载不足为凭。但西周若与其他民族的封建时代没有大的差别，那时一定是所有的贵族（士）男子都当兵，一般平民不当兵，即或当兵也是极少数，并且是处在不重要的地位。

关于春秋时代，虽有《左传》、《国语》内容比较丰富的史籍，我们对于当时的兵制仍是不甚清楚。只有齐国在管仲时期的军制，我们可由《国语》中^①得知梗概，其他各国的情形都非常模糊。按《国语》：

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

这段简单的记载有一点可以注意，就是工商人没有军事义务，因为只有十五个士乡的人才当兵。这些“士”大概都是世袭的贵族，历来是以战争为主要职务的。这个军队的组织与行政组织是二位一体的。行政的划分如下：

- (一) 国分十五乡——由乡良人治理；
- (二) 乡分十连——由连长治理；
- (三) 连分四里——由里有司治理；
- (四) 里分十轨——由轨长治理；
- (五) 每轨五家。与这个行政划分并行的是管仲所制定的军政

^① 《国语》卷六《齐语》。

制度：

- (一) 每轨五家，出五人——五人为伍，由轨长统率；
- (二) 每里五十人——五十人为小戎，即戎车一乘，由里有司统率；
- (三) 每连二百人——二百人为卒，合戎车四乘，由连长统率；
- (四) 每乡二千人——二千人为旅，合戎车四十乘，由乡良人统率；
- (五) 每五乡万人——万人为军，合戎车二百乘；
- (六) 全国十五乡共三万人——全国三军，戎车六百乘，由国君、国子、高子分别统率。

这是“国”的军队，是由三万家出三万人组织而成。所谓“国”是指京都与附近的地方，只占全国的一小部分。“国”中的居民除工商外，都是世袭的“士”，并无农民。工商直到齐桓公时（西前685至前643年）仍无当兵的义务。农民当初有否这种义务虽不可考，管仲变法之后却有了当兵的责任；但并不是全体农民当兵，而是拣择其中的优秀分子。据《国语》：

是故农之子恒为农。野处而不昵，其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有司见而不告，其罪五。

可见选择农民中的特出人才“能为士者”是有司的一项重要任务。

“国”以外的地方统称为“鄙”，一定有“士”散处各处，但鄙中多数的人当然是人口中绝对多数的农民。管仲所定的鄙组织法如下：



- (一)三十家为邑；
- (二)十邑为卒——三百家；
- (三)十卒为乡——三千家；
- (四)三乡为县——九千家；
- (五)十县为属——九万家；
- (六)鄙共五属——四十五万家。

国中每家出一人，鄙中却不如此；既然规定选择农民中优秀的为士，当然不能有固定的数目。但《国语》中说齐桓公有“革车八百乘”，而“国”中实际只有六百乘；其余二百乘，合一万人，似乎是鄙所出的兵额。这若不是实数，最少是管仲所定的标准。假定四十五万家中有四十五万壮丁，由其中选择一万人，等于每四十五人出一人当兵。^① 所以春秋时代的齐国仍是士族全体当兵，但农民中已有少数

^① 这些数目当然都是大概的成数，并不是精确的实数，但离实数似乎并不甚远。鄙中四十五万家，每家若按五口计算，共合二百二十五万人；若按八口计算，共合三百六十万人。至于国中人多半是士族，行大家族制，所谓三万家的“家”字不知何指。但与鄙相较，国在人口数目上可说无足轻重，我们仍可说三百六十万是齐桓公时齐国人口的最高估计。近代中国人口骤然增加，是与西洋接触后的变态现象，不足为比较的标准。经过满清一百五十年的太平盛世，乾隆晚年的人口大概可代表中国历代人口的最密限度。按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九《户口考》一，乾隆四十八年（此后没有分省的统计）山东人口为二千二百零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一人。这虽也是大概的数目，但自康熙废了人丁税之后人口的统计还大致可靠。这个数目与三百六十万为六与一之比，与二百二十五万为十与一之比。桓公时齐国的领土界线不清，但离今日山东面积的六分之一或者相差不远。即或当时的人口比较后代稀少，《国语》中的记载也与事实大致相合。

由法律规定也有入伍的责任。

别国的情形如何，不得而知。但在同一个文化区域内，各方面的发展一般都是一致的，春秋时代各国的情形大概都与齐国相仿。关于秦穆公（西前 659 至前 621 年），战国时代有如下的一个传说：

昔有秦穆公乘马而车为败，右服失而野人取之。……见野人方将食之于岐山之阳，穆公叹曰：“食骏马之肉而不还饮酒，余恐其伤汝也！”于是遍饮而去。处一年，为韩原之战，晋人已环穆公之车矣……野人尝食马肉于岐山之阳者三百有余人，毕力为穆公疾斗于车下。遂大克晋，反获惠公以归。^①

这虽是很晚的传说，但《吕氏春秋》是秦国的作品，关于秦国先君的记载或者不至全为虚构。由这个故事我们可见韩原一战秦国军队中最少有三百个平民出身的兵。

春秋时代虽已有平民当兵，但兵的主体仍是士族。所以春秋时代的军队仍可说是贵族阶级的军队。因为是贵族的，所以仍为传统封建贵族的侠义精神所支配。封建制度所造成的贵族，男子都以当兵为职务，为荣誉，为乐趣。不能当兵是莫大的羞耻。我们看《左传》、《国语》中的人物由上到下没有一个不上阵的，没有一个不能上阵的，没有一个不乐意上阵的。国君往往亲自出战，所以晋惠公才遇到被虏的厄难。国君的弟兄子侄也都习武，并且从极幼小时就练习。如晋悼公弟扬干最多不过十五六岁就入伍；因为年纪太小，以致扰乱

① 《吕氏春秋》卷八《仲秋纪》第五《爱土篇》。